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

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的 原因及思考

主 编◎冯绍雷 副主编◎刘 军

深度
解读
苏联
解体

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国外学术诠释
“power”视野下的中俄美三角关系
苏联解体对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的影响
苏联解体：谁之罪？怎么办？
俄国解密档案：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

时事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研究”

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的 原因及思考

主 编◎冯绍雷 副主编◎刘 军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思考/冯绍雷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80232-651-4

I. ①苏… II. ①冯… III. ①苏联解体—研究 IV. ①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65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4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SU LIAN JIE TI DE YUAN YIN JI SI KAO

第一部分 苏联解体研究

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国外学术诠释 冯绍雷 (3)

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 潘兴明 (28)

中亚国家独立 20 年: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评价 王海燕 (44)

苏联解体原因之我见 盛世良 (56)

走出历史的困境

——冷战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的

几个特点 汪 宁 (67)

苏共执政体制的弊端与后果 周尚文 (126)

制度供给过剩与苏联政治的衰朽 郝宇青 (140)

“power”视野下的中俄美三角关系 李 兴 孔 瑞 (151)

从 X 到 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于 滨 (167)

苏联解体对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的影响

..... 艾伦 C. 林奇 (190)

苏联解体:谁之罪? 怎么办?

..... 尤里·普罗科菲耶夫 张树华译 (204)

20 年后俄罗斯各派人士论苏联“八·一九”事件 刘淑春 (211)

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及其风险启示 王晓秋 刘世华 (226)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问题变化研究 胡廷新 (240)

第二部分 冷战终结及其思考

冷战终结与当前世界变化的十大趋势 ...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251)
俄国解密档案: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 崔海智 编译 (257)
中越同盟中的苏联因素(1950—1979年) 唐慧云 (273)
冷战与东欧
——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 郭 洁 (285)
对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东欧地区活动的
历史考察
——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兼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
原因 闫文虎 (310)
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
——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 崔海智 (327)
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新思维” 向祖文 张锦冬 (343)
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 夏亚峰 (368)
后记 (391)

SU LIAN JIE TI
DE YUAN YIN
JI SI KAO

第一部分

苏联解体研究

一场远未终结的辩论

SU LIAN JIE TI DE YUAN YIN JI SI KAO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国外学术诠释

冯绍雷*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解体和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至今还是引起人们巨大兴趣的辩论题目的话，那么像苏联解体那样刚刚过去 20 多年，还没有经过几百年、甚至千余年历史沉淀的重大事件，从时间的逻辑来讲，似乎依然被认为是不宜过早得出历史结论的。

当然，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目前对苏联解体的各种各样评价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对于苏联解体的评价不仅具有保持和延续历史记忆的作用，而且显然将影响人们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

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本文主要介绍了 20 多年来国外学术界是怎样利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研究等各个学科门类的知识和范畴，通过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学术性解释来深化我们对它的认识的。当然，即便是这样的学术性诠释，可能依然“为时尚早”，但它是更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一、“帝国”和“革命”范畴研究中的苏联解体

“帝国”和“革命”是晚近国际研究学界较多运用于苏联问题研究的两个学术范畴。虽然关于这两个范畴的功能效用依然有不少争论，但运用这对范畴进行研究的作品显然在逐渐增多，而且其结论也引人注目。在近代国家出现之前，帝国曾经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过的一个历史现象，比近代国家体系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帝国体现出的不仅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现象，还是一个国家间关系的和国内的治理系统。换言之，帝国不仅是一种消极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在国际交往和治理进程中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一个方面。

运用“帝国”范畴对苏联解体所进行的分析，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关于不同帝国的地理类型如何影响其衰亡的过程；其二是关于帝国的治理状态如何影响其命运的分析；其三是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对宏大的国际系统进行动态分析，观察其如何影响苏联的最终解体。

首先，关于是否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使用“帝国”这一范畴，西方学者也是有着不同看法的。有学者认为，苏联的非帝国性质并不宜从“帝国”范畴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比如，与19世纪帝国现象相比，苏联曾经长期获得人民支持，有着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广大疆域之内有如此之多民族混合居住，特别是意识形态曾经具有强大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毕竟“帝国研究”已经在国际学界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术方法在广泛流行，值得做一番介绍与思考。^①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帝国现象，诸如以皇帝为首脑的君主制国家、帝国主义殖民大国等，E. T. 盖达尔（Е. Гайдар）在《帝国的消

^① Gregory Gleason, *The Federal Formul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1-163.

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为俄国现象专门量身定制了一个“优雅的”定义：“帝国”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支配权集中于宗主国，而民主设置（如果有的话），抑或至少选举权未能普及到其掌控下的全部领土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类型。^①

这样的“帝国”定义与苏联解体有何干系呢？根据盖达尔的定义，原则上有两类帝国，即跨海帝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和领土毗连帝国（奥匈帝国、俄国等）。这两类帝国在衰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对于前一类帝国，由于宗主国领土与海外殖民地有着大洋阻隔，因此发生在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很难直接在宗主国的本土内得到反映。比如，发生在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和独立并不那么直接地对英国本土政治构建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而作为大陆型的后一类帝国，由于没有海洋将殖民地与宗主国分隔开来，宗主国与附属领土上占主要地位的民族共同体（宗主国）比邻而居，相互影响密切。帝国附属地或边缘地区的举手投足都会对帝国核心部位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特别是在帝国解体过程中，这两类帝国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大陆型帝国的政治结构由于疆域毗连、人口混居、文化一脉相承，往往会受到边缘地区政治和经济状态的直接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情绪高涨后的形势动荡就直接影响了苏联的解体。盖达尔甚至认为，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经验显示，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而成为一项并非容易的任务。^②

盖达尔进一步指出，多民族国家如果再加上集权政治统治，那么它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制度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首先会动员起那些准备利用民族感情的政治力量。而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明白这一“帝国”

① [俄] E. T. 盖达尔著，王尊贤译：《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② E. T.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17—33页。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挑战，也根本忽视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危险性。^① 显然这就成为苏联解体的动因。同时，盖达尔又强调，具有帝国传统的“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官和士兵的忠诚在他们的原籍所组建的新国家与宗主国以及他们所驻扎的那个帝国的行政当局之间被搞得四分五裂时，国家机关所遭遇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通常的结果只有一个：军人丧失采取行动的能力”。^② 笔者在这里指出这一特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诸如奥匈帝国等大陆型帝国的解体过程中，军人用兵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方面，这是催动反抗力量不受武力威慑，推进帝国解体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帝国解体有可能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像苏联解体这样的大帝国解体，居然大体是在和平背景之下实现的，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除了上述军队作用受到限制之外，另外一个重要背景乃是核威胁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制约解体过程不能过于受武力影响的外部原因。可见，大陆型帝国的连续性和海洋性帝国的非连续性乃是观察其兴衰存亡历史性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③

第二类帝国研究的特点在于对于帝国治理问题的分析。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沃尔夫森历史学奖得主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在对各个欧亚帝国进行了气势磅礴的历史性比较后，强调了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的一系列治理方面原因。在他看来：第一，苏联解体最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国外和国内赋予了自己过于艰巨而不切实际的使命（herculean tasks）。在内部，苏联试图在由文化、宗教和民族及其不同人组成的混合体上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群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此外，“普遍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快速的经济也是苏联国家合法性和生存的关键”。^④ 这意味着苏联不

① E. T.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220页。

② E. T. 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287页。

③ 于向东：“关于俄罗斯帝国性和民族性的对话”，《大观》2009年第5期。

④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30—339.

能以一个普通帝国身份存在，而必须既是帝国又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旗舰”。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必然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反对，“由苏联自身设定的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任务是一个太过艰难的任务”。这样的背景使得苏联必须极尽动员资源、投身于强敌的竞争，“而且国家意识形态如此紧密地与体制合法性相联”，一旦外部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第二，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原因，乃是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苏联意识形态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相互之间将会发生大战，这至少在1945—1991年这段时间里被证明是错了的”。意识形态可信度和合法性的丧失导致苏联“认同感”的缺失乃是帝国崩溃的重要背景。

第三，帝国往往因对于外敌的恐惧而兴盛，而“戈尔巴乔夫对外政治新思维一笔勾销了西方对于苏联安全的威胁存在”，从而大大降低了帝国存在的价值。

第四，苏联在“中东欧的非正式帝国形态堪称过度扩张的典型案例”，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已经成了苏联帝国的负担而不是利益。乌克兰、波罗的海、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第五，帝国疆域辽阔并且民族关系多样，因此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关系对于维系帝国显得非常重要。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经济改革伴之以揭露苏联过去的‘公开性’政策损害了莫斯科共产主义体制的合法性”，其推行的民主原则也使得地方精英有机可乘。中央与地方精英的关系由此变弱，帝国岌岌可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解体很难被说成是民主的不言自明的一次胜利。民主化虽然有限，但却对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

第六，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以及他对于改革战略和技巧的选择，包括他和叶利钦的个人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帝国走向崩溃。多米尼克·列文的研究表明，不同帝国的不同治

理方式将决定帝国的命运。^①

除此之外，有关帝国结构系统的研究视角也是分析苏联解体的工具之一。加拿大学者斯蒂芬·斯特里特（Stephen M. Streeter）认为，为什么那么多对于苏联极权主义的研究却没能预测到苏联解体，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帝国结构角度进行思考；而结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体是何性质，而在于其占首位的结构关系。从结构关系出发的观察有助于避免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② 斯蒂芬·斯特里特等人主编的《帝国与自主性》一书以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谈判为案例，认为这一场谈判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作为新帝国的美国正在开始以其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等多方面的主导性优势来限制其他国家的自主性。而作为另一大帝国的苏联就是在美国在其正式主权范围之外投放力的压迫下，宣告实际上已经接受妥协。这样从帝国外部环境出发的分析使得人们对于苏联解体的理解不光限于自身，而且有了全球性结构的宏大背景作为支撑。^③

“帝国”范畴的运用告诉我们，无论是从类型学意义上抑或是从帝国治理能力和质量的层次上，还是从帝国内部和外部结构的视角下，帝国内外行为的逻辑及其制约性乃是理解苏联解体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再来看有关“革命”问题的分析。如果说在几十年前，当国际局势发生动荡，特别是若干国家和地区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方式出现政治更替时，人们还不太习惯使用“革命”这一范畴来对之加以描摹，那么在几十年后，当“革命”一词已经被媒体和学术研究广泛使用于对发生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激进政治变动所做的描述和分析时，我

^① 转引自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3—85页。

^② 转引自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第155—185页。

^③ 转引自[美]斯蒂芬·斯特里特、约翰·韦弗、威廉·科尔曼主编，陈家刚等译：《帝国与自主性》，社会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197页。

们就有必要通过“革命”这一范畴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运用和分析来加深对苏联解体本身以及“革命”这一范畴的进一步认知。

对于“革命”的历史实证研究以及通过暴力实现政治变革的研究曾经是以往很多有关“革命”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变革，特别是发生在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转变过程中的国家地区的复杂政治经济转型过程的出现，“革命”范畴就更多地指向这样的社会政治急剧变化过程。

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管理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乌（Владимир Мау）在他的《大革命：从克伦威尔到普京》一书中曾经将俄罗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转型与历史上的英法革命相比拟。他认为，有关“革命”的现代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化和转型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①

那么，弗拉基米尔·马乌是如何看待“革命”这一现象的呢？

他认为：第一，“革命”不会产生在缺乏动态变化的稳定社会，这往往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现象有关。比如，早期现代化危机往往见诸经济增长的准备阶段以及最初的病态阶段，这一阶段危机要解决的是居民如何适应经济增长、尖锐的国际竞争等一系列极具动态性的问题；而成熟工业化时期的危机则产生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这时的危机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如何自我调节和国家如何调适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管理；后工业社会早期的危机则往往产生于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生态威胁等情况之下。上述任何一种危机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并且限制和阻碍对于变动中客观条件的调适，那么便会引发“革命”。第二，“革命”乃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转型，往往发生在国家管理弱化，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所发生的事件和过程的情况之下。第三，国家管理的弱化主要体现于社会的碎片化——在经济变动

^① Ирина 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 Владимир Мау, *Вели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От Кромвеля до Путина*,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的情况下，既定社会结构会受到新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冲击。第四，“革命”具有以下类似的进程：旧体制危机—反对旧体制的温和力量联盟掌权—温和政权的危机—受到保卫革命成果联盟支持的激进力量掌权—激进政权危机—热月派政变：新精英阶层伴随着财产状况的重新分配而形成、民众疲惫但又没有做好积极的政治准备，进而导致危机深化——这为国家强权的出台做了铺垫——“革命”之后基于新政治精英阶层及其联盟专制的形成。第五，“革命”后的专制往往是国家权力的强化，但并不意味着稳定，一般这样的不稳定状况会延续几十年。第六，“革命”往往是在大量偶然性因素积累之下形成的，“革命”的结果难以预言。第七，在一系列重要学术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有关“革命”问题的有关共识：诸如暴力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最主要标志；“革命”更多具有政治经济性质，而非原来单纯的政治性质；社会基本结构的碎片化较之阶级分析更加受到关注；“革命”中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更替并不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革命”后的专制并不意味着强有力国家管理的最终恢复。^①

那么弗拉基米尔·马乌是如何通过“革命”范畴来观察当代的社会变迁的呢？马乌认为，20世纪末在俄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就其属性而言无异于以往历史上的一系列革命，但是当代俄国“革命”并不以暴力为其特征，并且是从相对谨慎的改革逐步走向了“革命”。这场革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了苏联解体，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普京政府执政，这时“革命”时期才走向完成。^②

如果说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范畴研究较多的是从纵向的历次革命以及每次革命周期性历史变化来进行的比较，并勾画出苏联

^① Ирина 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 Владимир Мау, *Вели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От Кромвеля до Путина*,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pp. 418—433.

^② Ирина 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 Владимир Мау, *Велико Путина*,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pp. 418—433.

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政治变迁的特征，那么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的《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一书则更多地从一般社会体制转型的横剖面分析来刻画俄罗斯世纪末的“革命”。迈克尔·麦克福尔的研究作品之所以值得关注，不光是因为这位学者是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受到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最高当局重视的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而且对他的关注甚至延续到了奥巴马总统时期。2011年底，麦克福尔就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这是国际关系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学而优则仕”的一个例子。

迈克尔·麦克福尔与弗拉基米尔·马乌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两人都是把从苏联至21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政治转型视为一个“革命”过程。麦克福尔明确地提出：“到1990年秋天，形势已经很清楚，苏联特别是俄罗斯处于社会革命的中途，这次革命的规模堪与现代史上其他几次革命相媲美。”^①

稍有区别的是，麦克福尔对于俄国“革命”的评价要稍低于弗拉基米尔·马乌。弗拉基米尔·马乌把俄国转型与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进行比较之时，强调了前者的优越之处；而在麦克福尔看来，俄国“革命”不光行进艰难，认为先是经济、后是主权边界之争，真正民主的改革很晚才问世，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暴力因素”（指的是1991年8月的莫斯科“政变”和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②

麦克福尔首先是强调了两个背景性变量：争议的转型议程和敌对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就前者而言，这位现在已经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前学者”非常有意思地提出，有关转型议程的经验表明，凡是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的国家鲜有成功的可能；与其分兵两路，还不如攻其一点，集中精力抓好一个方面的改革，或许还能够有

^① 转引自[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唐贤兴等译：《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8页。

^② 转引自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1—4页。

所突破。^① 就第二个变量而言，麦克福尔挑战了转型问题的理论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提出的命题：权力之间的不确定的平衡更容易走向最民主的安排。因为在普热沃斯基看来，“民主不可能产生于专制，它只能在协商中出现”。^②

而麦克福尔反驳道，权力不平衡、不对称状态才是民主产生的前提，甚至提出民主“可能通过强制而产生”的结论。麦克福尔在这里指的是，转型过程中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无法真正产生民主，相反，叶利钦这样的强权人物甚至在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中动用了武力，才使俄罗斯有了民主制宪的可能。^③

值得注意的是，较结构性因素来说，麦克福尔在俄罗斯革命性转变过程的分析中更加强调个人角色的因素。他提出，中长期条件下，结构性因素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在苏联发生“革命”的较短时期之内，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个人角色的巨大作用。他强调，结构性因素并不决定结果，个人因素才决定结果，“推动这部苏联/俄罗斯转型戏剧的是最终由这些个人在关键点上偶然作出的决定”。^④ 显然，这与帝国范畴对于苏联解体进程的观察有所不同。

无论是从“帝国”范畴，还是从“革命”范畴的运用来看，虽然上述这些学者还只能从其带有个人特点的研究角度提出对于苏联解体以及围绕解体的历史过程的想法，但与单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做的研究相比，这些判断显然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① 转引自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6—8页。

②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0.

③ 转引自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13—14页。

④ 转引自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371页。